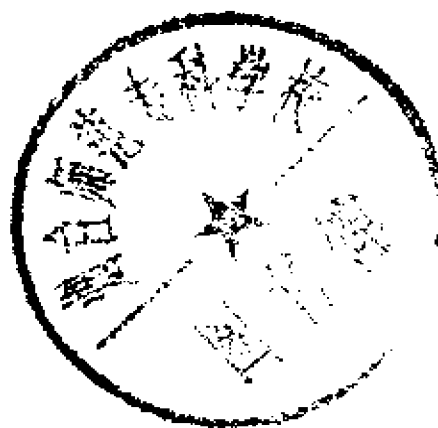


14303

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十二辑



11.37

5068

一九八三年一月廿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

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	晏道刚(3)
随薛岳所部追堵红军长征的见闻	魏鉴贤(48)
何健部阻截红军长征的回忆	李 觉(63)
桂北堵截红军记	张文鸿(80)
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	王家烈(85)
侯之担部防守乌江的溃败	侯汉佑(96)
柏辉章部在娄山关的溃败	刘鹤鸣(105)
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	
.....四川政协文史研委会 军事史料编写组	(109)
红军过黔时蒋介石在贵阳的狼狈相	王天锡(124)
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	孙 渡(129)
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	
.....张伯言 杨学端 朱戒吾 张 怀猷	(147)
胡宗南部在毛儿盖被歼记	李日基(178)
胡宗南率部在川北阻截红军的经过	范汉杰(183)
鲁大昌部在腊子口的溃败	张觉僧(190)
东北军一一〇师劳山就歼亲历记	周祖堯(195)
东北军骑兵师吴起镇被歼目睹记	马培清(200)
东北军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	
.....沈叔明 王肇治 邱立亭 唐振海	(205)

附注 对《随薛岳所部追堵红军长征的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十一辑二一三页。

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 部署及其失败

姜道刚

一九三三年(在蒋军第四次进犯中央苏区后期)何应钦任我为“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处理作战业务。不久,蒋介石亲到南昌改组“行营”,我仍为第一厅副厅长主管作战业务。一九三四年三月,蒋创设“侍从室”以统率其随行人员,调我为侍从室主任。在举世闻名的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进军中,我随蒋往返于重庆、贵阳、昆明、成都、西安等地策划追堵。迨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我又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作蒋介石的帮凶,干了许多大大危害人民的事情,因此对蒋介石追堵红军的阴谋内幕大体有所了解。今响应周恩来主席的号召,把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凶残恶毒的罪行,就我所能回忆到的如实揭露出来。但已年近八旬,事隔三十年,错漏在所不免,请有关方面加以补正。

一、红军长征前蒋介石的反共策划

自一九三〇年冬到一九三三年夏,蒋介石在江西发动一、二、三、四次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均被红军挫败,损将折兵三十万以上。“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因第一次失败被撤换;继任的何应钦,亦以二、三、四次的失败,怯蒋谴责而惴惴不安。加以蒋介石径听陈

诚报告不通知何应钦，听任陈诚将调赣参加反共的川军张英师突然缴械，使何十分气愤，事后虽经贺国光等密告蒋介石记陈诚大过一次，以敷衍何的面子，但何终觉对陈的指挥不便，借故返回南京。蒋介石乃亲到南昌，一再改组“南昌行营”，以江西主席熊式辉兼“行营”办公厅主任，“行营”原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厅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扩大职权达于粤闽湘赣浙五省，变该“行营”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法西斯权力机关，与当时伪行政院长汪精卫权力冲突亦在所不顾。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迭次失败，在痛苦中受到了一些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一面调整部署，发表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赣粤边境；一面由我和贺国光归纳各方面建议制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蒋介石大肆宣传他在军官训练团所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数十万兵力的军事围攻。蒋介石这些毒辣阴谋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以前逐步付诸实施。我和贺国光还挖空心思替他制订了各个阶段各种情况变化的军事部署计划。

约在一九三三年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发动反蒋，使北路军的进攻计划受到很大影响。当时蒋介石进到抚州指挥，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神色异常紧张。好几次我与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

舞掌。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逢他出现丑态时，宣铁吾（蒋的侍卫长）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原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坛，都被宋揪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杂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实使蒋的日子不太好过。每天晚餐后，蒋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后来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才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进攻十九路军的战事。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在解决福建事变后，趾高气扬，以为又可以专心对付红军了，乃将进攻福建的二路军、四路军、五路军编为东路军，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转头向西进攻苏区。约在三月间，蒋又发表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何即在长沙召集有关头目开会，并请行营派员指示。蒋乃派我飞往长沙与何会商调整西路军指挥序列，督促何执行围攻计划，允许何在湖南发行公债作为反共经费。何键并请我对在湘鄂赣边及赣江西岸参加围攻的湘军、杂牌军、蒋嫡系军各部队长传达蒋的意旨及对红军作战应注意事项。蒋介石恐西路所属各军头目不听何键的命令，要我特别注意从中协调。

一九三四年四月以后，蒋介石令各路军步步向苏区进攻。我随蒋回到庐山策划指挥，并举办军官训练团统一战术和政治思想。当时，东路军李延年纵队在朋口，汤恩伯部在泰宁，遭红军反击受创；北路军陈诚的三路军在黎川以南之团村、黎川西南之横村及南丰之王家山、五都寨等地区，也受到红军反击；南路军李扬敬纵队在粤赣边之筠门岭，受到红军反击。由于蒋军据有碉堡线，在红军

迭次打击下,虽有很大的损耗,但包围的总形势仍能维持;而且蒋军官兵对修碉技术日益熟练,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不少困难。是年夏,陈诚部攻破广昌,薛岳部侵占兴国、古龙冈,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驿前构筑工事进行阵地战。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马上把重炮兵调到江西配合他的十个纵队近三十个师兵力加紧进攻,遂于九月攻占宁都、石城。

一九三四年九月,蒋介石曾对我们几个高级幕僚说,看来红军现已无法施展其机动灵活的战术,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已成被动之局。他于是下令各路军加紧包围,还写了许多亲笔信给高级头目们勉以雪一二三四次“围剿”失败之耻。这时蒋介石口口声声要把红军消灭在包围圈内,作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毕竟能够突围长征,夺取胜利。

上述这些就是一九三三年四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军长征前,我在蒋介石身边所亲见和自己参与策划的一些基本情况。

二、蒋介石得悉红军西移时的决策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蒋介石认定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胜利在望,显得飘飘然。他每和我们侈谈形势时,洋洋得意地说:“湘鄂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以此显示他的指挥比别人高明。在谈到红军历次提出北上抗日及合作抗日时,他总是诬蔑红军说:“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他强调说:“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这些谈话正是暴露了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卖

国政策。

国内舆论自塘沽协定之后到“五次围剿”后期,对蒋不抗日专反共的搞法早已不满,华北人民尤其激烈。蒋认为这都是对共产党同情,对当前“围剿”非常不利。为了便于一心对付红军,收最后围歼之功,约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蒋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北视察,杨永泰和我随行,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头目。当时“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回南京去了。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邹致权(张学良之办事处主任)等,在察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他那“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行”的反动谬论,争取大家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十月中旬突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丰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于是蒋介石匆匆赶回南昌,立即召集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和我商谈对策,议论纷纷,对红军行动方向作了如下判断: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蒋认为: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亦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认为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三)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杨永泰以为还要考虑红军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随后蒋还对大家说：“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又说：“红军不论走那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红军西移前锋迅速达到赣湘粤边。从蒋军东路军占领瑞金所得资料中已明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蒋介石在南昌于是日下午七时召集我和贺国光谈，拟定初步追堵的计划要旨，限九时以前发出电令。当时我正患偏头痛，勉力支持草拟计划电文，每隔十几分钟蒋即以电话催问贺国光是否拟就。贺对我说，蒋似有迫不及待，挂电话听筒之声甚重，要我迅速草拟让他去看算了。依计划要旨发出的电令大意有：1、西路军何键部除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路总部移驻衡阳；2、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总部推进至韶关；3、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4、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委何人担任的问题，蒋初意是内定陈诚，而陈却保荐薛岳。后来蒋同意以薛岳充任，决定抽出九个师的兵力归薛岳率领；陈诚则任预备总指挥，集中亟待休整的嫡系部队作为机动兵团策应各方面的需要。迨十一月上旬，红军先头到达粤湘

边,蒋认为何键原是西路军总司令,红军进入西路作战地境,一面明令发表何键为“追剿总司令”,一面命我电告何键指明薛岳所部入湘后悉归何统一指挥。但蒋并未把这样做可将何键部调离湖南而使何键更易受控制的企图明确告知薛岳。这件事曾引起狂妄自大的薛岳不服。我当时对调动嫡系及何键的部队没有顾虑,只想到两广是半独立状态,不如湖南那样基本上能控制得住,蒋粤、蒋桂之间疑忌很深,粤桂怕蒋军嫡系乘机入侵并不下于怕红军。当蒋命我严电陈济棠、李宗仁全力防堵时,我曾对蒋说:“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蒋说:“你不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执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几句话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蒋对粤桂的阴谋诡计。

十一月间,追堵部署初步完毕,蒋介石即调整留在江西各围攻部队的部署,分区清乡,划定好几个“绥靖区”,订立各种清乡规章,采用所谓“剿抚”兼施的毒辣手法来危害人民。军事部分由第一厅主办。政治、经济、文教部分由第二厅和办公厅主办。同时借口红军可能去西南,蒋介石把他策划已久的组织参谋团入川的计划乘机拿了出来,决定以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为主任率参谋团进驻重庆,统帅川黔各部配合反共。

三、在粤湘桂边布置各道封锁线和追堵措施

粤湘桂边区封锁、追堵红军的部署和战役,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亲自在南昌指挥的。名义上何键是“追剿”总司令,薛岳是前敌总指挥,事实上在派系林立下的国民党政权,牵涉到三四个省、上十个军(粤军两个军、湘军三个军、桂军两个军、薛岳所率嫡系三个

军)三、四十万兵力的规模,即令蒋介石亲自出马也是不可能指挥的,因此始终是以南昌行营这套机构在那里敷衍行事。

红军西进,于十月下旬突破赣南余汉谋部的封锁线(即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即电陈济棠、何键出兵火速在汝城、仁化、乐昌间地区阻截(即第二道封锁线),并指示他们分兵在乐昌、郴州、宜章、临武间沿粤汉路南段利用原有碉堡加强工事作防堵措施(即第三道封锁线)。当时湘军主力已来不及向粤边靠拢,只能次第集结于衡阳、郴州间,在汝城守备的只有陶广所部一个旅。粤军一、二军主力及几个独立师原已集结于湘粤赣边,这时陈济棠令李汉魂统率独三师、独二旅及第二师赶到乐昌、仁化、汝城附近进行堵截。十一月上旬(九、十天左右)粤军和红军在延寿圩、靶子场、珊瑚岗附近激战两日,陈济棠曾向蒋告捷,虚报伤亡及俘获红军人数,发现中央红军一、三、五、九等军团番号。蒋介石认为延寿战役是弄清红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在这一仗以前行营命空军侦察红军动向,总是找不到真实具体的情况)。与此同时,何键以原在湘南的一个旅(旅长钟光仁)守汝城,在十一月上旬也与红军打了几天,没有激烈战斗,估计红军对汝城意在牵制。何键向蒋介石告捷,无非表示湘军反共是卖力的,在湖南境内抗击红军他是舍得牺牲的。自十一月上旬经过湘粤边阻截之后,蒋介石对红军情况自认为已经比较明了。

蒋介石为了对付红军长征的行动(当时称为突围)虽考虑了几个方案,而在他心目中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所部红军会合,将来在鄂湘川黔建成一片苏区。故当十一月中旬红四路军、红六路军主力先后行进至郴州、耒阳、衡阳之线后,蒋认为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指红军

放弃根据地),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即第四道封锁线)“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令何健、薛岳在衡阳开军事会议。

当时蒋指示何、薛的部署要旨有如下几点:

(一)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即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吴奇伟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这五个师是归薛岳直辖的),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是怕与红二方面军会合)。

(三)以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二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五)以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这个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蒋介石是很用了一番毒辣心机的。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健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李韫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跟踪追击地势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边,红军欲仓促

建立苏区亦不容易。当蒋在南昌决定这一计划时，我个人也认为红军在战略上已陷入不利态势，是否能渡过湘江、潇水这一条地障，的确是红军成败的一个大关键。

蒋介石在下达命令时，怕他手下的头目们不认真贯彻执行，叫我引用古代兵家尉繚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把它写进电令中。他妄想他的娄罗们能够依照他的计划行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好好打一个歼灭战。

当红军先头部队越过粤汉铁路宜章、临武地区，蒋在指示何键、薛岳部署的同时，曾电陈济棠派兵进占连县、星子防堵，并指定李汉魂（由于延寿战役见重于蒋）率二、三师人编一个纵队进至蓝山、江华地区防堵红军入粤。那时蒋为利用粤军参战，要我们在电令措词上尽量客气，特别是对粤军仁化、延寿之役一再嘉勉。

红军进入湘粤边时，蒋只命白崇禧在桂北防堵；当红军进据湘南后，蒋即电白崇禧集结桂军主力于灌阳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并要白崇禧至灌阳指挥。这时蒋介石为了利用桂军，特别发了一笔相当大的军费（具体数字记不清）。总之蒋介石是挖空心思策划湘桂军联合作战堵击红军，唯恐不达目的。

湘桂边的追堵战役进行的时间将近两周（由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二日），真正苦战的时间约为一周，使用兵力二、三十师。这个时期，蒋介石是聚精会神，行营则函电交驰。陈诚自调预备军总指挥后，基本上是呆在蒋介石身边，赞助策划。由于薛岳唯陈诚之命是听，因此第六路军的行动多由陈直接秉承蒋的意旨行事。有时蒋陈密议的问题，作为侍从室主任的我，也不知道。在十一月下旬会战开始后，蒋介石曾亲笔写信给第六路军薛岳

以下各军师长，诬蔑红军为“流寇”，认为这次向西突围已“势穷力蹙”，规定该路军九个师以穷追为首要任务，信中且有“毋容红军再度生根”等狂言。蒋惯于用权术收揽部属为其卖力，他自己写信频繁，内容不给别人知道，我只是事后与蒋闲谈中了解一些（当时蒋派有飞机一队驻衡阳助战，蒋的信件均由我通知飞机空投）。

在战役过程中，战报雪片飞来，我阅后凡属重要的即交给蒋的机要秘书汪日章摘要转给蒋看。我素知陈诚、薛岳见重于蒋，蒋对薛的来电比较重视，因此薛岳的来电在当时是不能积压的。至于这个仗是怎样打的情况，时隔太久，只能记忆大概如下。

（一）薛岳所率吴奇伟部及直辖部队，由于红军不是由永州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该部在湘南境内没有战斗。但薛对何键的湘军及白崇禧的桂军这样摆长蛇阵未阻止红军通过湘江，曾向蒋表示他的不满，对白、何等怕“中央军”抢地盘的处置也有所揭露。这一点我当时是理解到的。薛岳所率周浑元部，这次也没有大的战斗。惟该部抢先占领道县，使红军行动受阻，达成战略任务，曾受到蒋的嘉奖。

（二）湘军刘建绪部在全州觉山堵击红军两天。红军主力是从觉山以南的文市向界首渡湘江的。刘建绪及何键向蒋告捷，虚报伤毙红军人数。他们为逃避湘江失守之责，曾指控桂军撤出文市以南各关、私自转移兵力并未通报友军之罪。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我知之甚深，对他们这种所谓捷报，我心里很明白。但嗣后蒋介石未曾追究湘江失守的责任，还给何、刘两人嘉奖。非何键嫡系的湘军李塹珩部由于进入湘南时间迟，沿途没有和红军接触。湘军李云杰部在宁远天堂圩及湘江东岸的下灌、水车附近与陈光中部合力对红军后卫作战，蒋介石对李云杰也有嘉奖。

(三)桂军白崇禧所指挥之夏威、廖磊两军在前线的部队,为保全实力,未照蒋介石的指示扼守灌阳以北完成堵击任务,自动撤至灌阳、兴安间新圩附近占领侧面阵地,阻击红军掩护部队,打了两天,红军主力即安全渡过湘江。事后白崇禧亦来电虚报战果。这件事却大伤蒋介石的脑筋,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

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当时行营综合各方来电,估计红军渡过湘江向贵州前进途中实有兵力不过三、四万人,认为红军牺牲、损耗很大。惟蒋介石意犹未尽,责怪桂军避开正面,以致功亏一篑。

自从红军西征后,我们在蒋身边的一些人闲谈时,总说追堵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怕接近红军被红军反击挨打,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蒋军不得人心,士气不振,于此可见一斑。

四、在贵州指挥黔、川、滇作战的挫败

(一)红军入黔初期蒋介石的企图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红军突破湘江向贵州前进时,蒋介石担心中央红军会走萧克的老路与贺龙会师,除电王家烈率黔军在黔东堵截外,一面电何键、李宗仁派兵尾追,一面电薛岳率主力经武冈、芷江入黔以防阻红军会合。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击破黔军渡过乌江解放遵义,蒋乃将防堵红军会师的任务交给刘建绪,令刘部进至黔东石阡、印江沿乌江东岸布防,并电原在鄂川边的徐源泉(第十军)派兵进至酉阳、秀山与刘建绪部联防。当时湘西红军正在沅陵以北进行反攻,策应入黔的中央红军。何键深恐湘军入黔

后他自己失去控制,乃借阻击湘西红军为由,苦苦要求调回其亲信部队李觉、陶广、章亮基等师回湘西,蒋介石允其所请,于是刘建绪只带四个师布防黔东。这时蒋令薛岳率所部八个师不顾王家烈是否愿意,乘黔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沿途并未与红军发生大的战斗。

在政治上,蒋介石早已安下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阴谋。我最初是从陈布雷处得知这一阴谋的。当红军于十二月进入黔边时,蒋在南昌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薛岳进占贵阳,正是这一阴谋的具体行动。

(二)川、滇、黔边追堵战役的挫败

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由遵义西进时,蒋介石认为红军已威胁川南,可能北渡长江,急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及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二十一军可能抽集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又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堵击,封锁横江;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急调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蒋一度计划调第三军王均部滇军入黔,后来怕龙云误会而中止);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现名大方)侧击;控制主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一月底,川军旅长郭勋祺率兵九个团在土城附近顽抗两昼夜,被红军击败。蒋据报后认为郭勋祺“鏖战有功”,立即

升郭为模范师师长，同时以守乌江的侯之担作战不力，令参谋团拘押查办。在红军压境下，蒋对川、黔军阀一赏一罚，不仅是施展其对部属威胁利诱的惯技，也是他欺软（黔军阀）怕硬（川军阀）的表现。

二月间红军进入滇东行动情况不明时，蒋介石从贺国光、薛岳送来的情报中，知道有遵义会议，从此毛主席全权指挥红军行动，引起他很大注意。他一方面认为红军内部意见有分歧，幻想红军会不统一，会各据一方；一方面觉得更应加紧围攻，不可轻敌。蒋随即调整战略部署：以何健为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以龙云为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主任，负责对付中央红军；以朱绍良为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

在贵州的二路军作战序列也重新划分，以吴奇伟部编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编为第二纵队，滇军（第十路军）孙渡部编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编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编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祺部编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韫珩部编为第七纵队。蒋介石妄想将红军压迫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正当蒋介石打着这个如意算盘时，不料二月下旬红军挥戈东向，击破王家烈在鲮水前线部队，势不可当。蒋得此情报，研究对策，认为红军北渡西行均遭阻拦，黔北穷困，不可久留，回师向东一定是再图去湘西与该地红军会师。于是急命薛岳拿出吴奇伟部由贵阳驰援王家烈坚守遵义、娄山关，令上官云相部驰援桐梓，令刘湘督促郭勋祺部尾追，并令一路军何健注意黔东防堵。虽然是仓卒应战，但以为围攻军队已处于绝对优势，这样就可扼阻红军。那知到了二月二十六日左右，红军竟乘胜再度攻取遵义城，击

破了王家烈直接指挥的好几个团。吴奇伟部赶到遵义城外接战，不到一天就被红军打败，狼狈退回乌江南岸。事后得知吴、王两部，伤亡损耗在万人以上（柏辉章、韩汉英、唐云山三个师均被歼过半，郭勋祺师在温水尾追的损失不计在内）。这是蒋介石布置川、黔、滇围攻中最大的一次失败，他在指责薛岳的电文中认为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挥戈东向，二渡赤水，打了蒋军一个措手不及，这是蒋介石最初意料不到的，也就是毛主席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使他不得不犯错误的一个明显例证。

（三）再度乞灵于碉堡战术

在遵义战败后，蒋介石坐立不安。两三天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他就飞往重庆，住在范庄（范绍增之家），陈诚和我随行。遵义失败的真情，陈诚为掩盖薛岳，不敢如实向蒋报告。我当时也有顾虑，因为薛岳部队一向归陈指挥，薛部失败，陈不说而我说，不仅陈不满于我，蒋会以我有嫌隙于陈，也对我不满。蒋到重庆后，不仅因前方打败仗恼火，另外又因何应钦在北平受到国人责难，且遭日寇的过份侮辱（甚至日本一个士兵可以到何之办公室直呼其名而唾其面），赖在南京许久不回北平军分会，使他更加大发脾气，责骂何应钦“怕死就不要穿军服”。我委婉建议蒋作出处置，稳定一下华北局面。蒋生气地说：“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到华北去和日本顶？共军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了，拿什么打日本。”这些话说明蒋一心反共，不惜向日寇屈膝。

薛岳、吴奇伟在陈诚庇护下没有受到蒋介石的惩处，王家烈丢失桐梓、仁怀、遵义等地，蒋一时也不便追究，只针对这一教训下了